

全球女权主义
的比较案例研究
妇女的活动与学术研究
参与团队：中国

柯倩婷访谈文字稿

地点：中国广州
日期：2019年12月2日

密歇根大学
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

密歇根州安娜堡 1136 Lane Hall, 48109-1290

电话：(734) 764-9537
电子邮件：um.gfp@umich.edu
网站：<http://www.umich.edu/~glblfem>

版权所有：密歇根大学董事会，2017

我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同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面我也做一些和妇女权益研究有关的研究以及妇女儿童权益保护这方面的工作。

我自己小时候是成长在广东西部的农村，在我们那里还是挺重男轻女的，基本上都想生很多的儿子，那我父母也不例外，ta觉得最起码得两个儿子。那我母亲其实生了5个孩子。刚好生到第二个时已经有了计划生育。当时她为了逃避计划生育，基本上是一怀孕了就要出去躲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妈妈受了很多苦，我自己也学会了独立。但在那样的环境中我就意识到我家里好像很重视儿子，而女儿好像是多余的。不过也很矛盾，就是我父母其实也很爱我们，女儿，主要的表现就是要供我们读书，所以我们都读上了大学。当时来说，我们村里面还没有女孩读大学，我就是第一个读上了大学，并且后来读博士也是，就是我们村应该是现在也还没有别的女性还有读到博士学位。所以我成长来说，虽然（我的家庭）认为女孩子总是泼出去的水，也还是给了我很好的成长的空间。

问：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接触到女权主义思想？

答：在最早 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会是什么，但是因为我刚刚出来工作，在大学里面，我们刚好有位女生她想竞选学校的学生会主席，我想我应该支持她竞选。可是，怎样寻找到更好的竞选口号呢？我们就查到新闻说，刚好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们就学习了这个会议有什么精神。那我们就在竞选的大纲哪里说世界妇女大会都已经在北京召开了，那么女性也可以成为很优秀的领导人。所以我们的同学她的竞选打动了很多人，她成为了学生会主席。

这是一次实践，后来真正接触到理论要过几年之后，就是 1999 年我开始做硕士论文。我的硕士论文就是跟随着中山大学的艾晓明教授来做研究。她建议我去做女作家研究。但是为了做研究，她给我列了很长的书单，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那么这个对我来说整个是全新的领域。但在接触理论的过程中其实对我冲击非常大。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我小时候看到了，或者自己亲身经历了很多重男轻女、性别歧视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个理论去真正地解读 Ta。后来这些理论就让我反思我的成长，反思我的家乡那里的文化风俗，这也算是播下了一个种子，让我开始觉得这个理论很有价值，对于我个人成长也很有用。

问：那你是如何和为何进入女权主义的学术研究呢？以及您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什么？

答：我是从 2002 年开始继续跟艾晓明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我们的专业是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不过同时艾晓明教授也认为我们的比较文学专业要有特色，这个特色就是进行性别研究、文化研究。我就开始跟艾晓明教授进行理论翻译，当时翻译的女权主义理论著作，第一本就是罗斯玛丽·帕特南·童的《女权主义思潮导论》。紧接着我们又翻译了《性别与语言》。这样的著作的翻译使到我和我的团队一边翻译一边学习。同时也是很巧，2002-2004 年时我们有一个班，这个班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王政教授她筹集的资源在北京的中华女子学院开班。这个班她邀请了美国的、香港的以及中国的著名的教授来给我们开课。当时开出来的女性主义理论还有一些各个学科的研究，就是跨学科的研究，内容都非常地丰富。同时，当时理论给到的课程难度很大，但是我们同学的学习热情也很高。这样的一些基础学习之后，我就进入到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我的博士论文后来成书的是《性别、身体与创伤》，研究的是中国当代小说。那么我的学术就开始从这里起步了。同时后来呢我又开始更多的关注到中国的社会文化领域的一些问题，从作家研究转入到文化、社会和政策这些方面研究。

问：那你是如何、为何进入女权主义的社会活动呢？以及你主要参与过组织过哪些活动？

答：社会活动方面，一开始我们主要是把文学分析的方法用回到戏剧分析。我们比较早分析了一个伊娃·恩斯勒的剧本叫《阴道独白》，但是很快我们就有机会去演出，在大陆的中文版演出。那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演出《阴道独白》可是恩斯勒的版本我们中国人觉得很多都跟我们中国的经验有点隔离。Ta 们讲的比如说美国的白人的中产阶级的一些关于阴道的跟性的经验跟我们，觉得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于是我们就做了一些本地的采访和创作。

我当时也写了一幕剧，就是先是采访了一些人，然后就写出中国女性所遭受到的这种性的禁忌、性的压抑这样的故事。随后我们就开始更多关注社会新闻的问题。也就是在那一年的我们中山大学的化学系的一位研究生叫苏尚妍的，她在和男友约会的时候就在我们的学

校的东湖上面，就被她男朋友杀死了。对我们来说冲击非常大，因为那条路就是我们从教学楼回宿舍的必经之路。而且她的男朋友只是要求复合而得不到。当那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发现我们中大的学生，以及很多大学生、网友就会想说苏尚妍一定是她出了什么问题。是她劈腿、对爱情不忠贞，所以惹怒了她的男朋友，而没有人去谴责她男朋友，反而觉得她男朋友很英雄，是为爱情而杀戮。

那么我们就把我们学到的性别知识、把我们的想法写出了很多的文章。基本上我们的研究生每个人都要写文章，去发表在网上进行讨论。终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觉得我们影响到了我们的同学，就是这些人开始意识到了，没错，是应该去悼念逝去的生命，应该去谴责施行暴力的人。这件事发生没多久，中国又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湖南湘潭的一位音乐老师，她和男朋友拍拖，晚上约会，在约会期间死去了。报案之后，警察认为一直在她身边的男朋友没有嫌疑，完全没有对他有什么要去侦查的。这件事在网上引起了非常大的讨论，我们也是介入到这件事情上。首先一个是和她的母亲取得联系，并且协助她去取得司法公正的努力。我们回到学校，就发现苏尚妍、黄静，这样的事件应该引起我们同学更深的反思。所以从此我们就在校园里面组织一些活动，并且同时也邀请受害者家长一起来推动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活动。这时我们也发觉说全球也有每年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十日的十六日活动，这个十六日活动全球都在开展活动来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我们就让我们的学生意识到这是一个全球的活动，我们在校园去处理本地的问题，但同时也是跟全球有一个连接。从这个时候开始，每年我们学生的活动，到十六日的时候，就一定都会举办活动。

同时我们除了关注受害妇女以外，我们也意识到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运作结构是一样的，对弱势群体来说都是采取同样的逻辑。所以我们也开始关注到，从校园开始，到社会里面的 LGBT 的群体。那个时候也是校园里面有一些同学，希望能够有表达的机会。首先我们在学校里面是支持同学办读书会、观影会，并且我们开设了一门多元性别的课程。这门多元性别的课程也不仅仅是讲理论，我们也邀请中国的那些组织，同性恋、跨性别、间性人这些组织的领导者或者是个人的活动者来到我们课堂跟我们同学分享，ta 们是怎样看到

了社群需要解决的问题，ta 们怎样反歧视，ta 们怎样让这些人站出来，一起去争取 ta 们的权益。这样一些很鲜活的例子也开始让我们同学意识到这个事情并不仅仅只是书本上的这些，我们同学是可以一起来参与的。所以同学们也很快会去分小组，小组组织调研，去采访这些机构，探访这些机构。ta 们也成立机构来关注推动校园的对性少数的友好环境。

问：在女权的研究和活动中，女权主义是对你产生了哪些作用和影响呢？以及您的女权主义立场是如何进一步发展的？

答：进行研究和参加一些活动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是把我从纯粹的书斋生活拉出到了一个社区、社群里面来。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关注新闻的事件其实也是抽象的，但是后来呢艾晓明教授以及我们团队都觉得应该去接触这些受影响的人，于是我们就去到联络 ta 们，跟 ta 们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有更多的人向我们求助，于是我曾是试过带着受性侵的大学生报案，因为他们的报案需要有老师带着去报案哪些警察才比较重视。我们也去过工厂里面跟女工一起来想想她们可能有一些什么课程给她们，有什么资讯给到她们。同时我们还去到一些社群里面去宣传反家暴知识。去到社区我们才知道说，宣传反家暴的知识，社群的老人家、孩子、家庭妇女她们并不是那么想听你们说这些东西。于是我们就开始演戏，发展出互动的戏剧去到那里，演完戏了再派一些小手册给到 ta 们。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接触到很多受暴的妇女，她们也会愿意和我们做开心门，我们也是这样才有机会接触到和了解到她们真实的遭遇。

我还去过像河北和河南的受艾滋病影响的妇女和儿童那里做志愿者，也是知道，全球的一个大的疫情它不仅仅像其他国家的只是影响到男男的社群，其实在中国它还大量地影响到卖血的妇女儿童。

这样的一些经历也让我对女权主义的立场有一些变化。早期我主要就是关注妇女儿童，后来我也进一步关注到像老人、残障人士以及 LGBT 的社群，ta 们所遭受到的歧视、ta 们社群发展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变化是原来我主要是关注文学文化，这是我的专业，但是随着我们对社会的了解我们也知道，如果这个社会想要更好，那同时要改变政策以及法律，那我同时也开始关注比如说反家暴立法，一起参与推动立法，也做研究谈我们社会怎样才

说有性别友好的政策。这些才是能够让这些人更好地、尽快地从政策法律里面得益。所以我的立场变化除了是我做事的方式变化，当然因为我更多地看到了每一个受害的人，我也更注重理解 ta 们个体的差异。早期比较是强调不同社群里都要抱团，就是你要联合起来。但后来就发现说你让 LGBT 群体、妇女群体、残障群体联合起来只是一个想想，ta 们各自有各自的目标，ta 们很不容易联合起来。后来我发现，你觉得联合起来力量大，可以相互理解、相互支持，那到了现实中它不一定是这样。在现实中每一个社群 ta 反而是要找到自己的目标，就是你找到你这个社群需要发展、需要倡导的是什么，我可以寻找的资源是什么。也就是说这种差异性可能是更能给到这个社群发展的动力，而不是说认为我们通过一起来做很多事情就是人多力量大。这也算是我自己立场的变化。

问：您是如何将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相结合的呢？

答：我做学术研究、社会活动的结合可以有两种：第一种是我先做学术研究，如果我对这个领域已经了解得很深了，我会和我的学生一起、和朋友们一起做一些活动。举个例子，从 2008 年开始我关注到中国有很多做美容整形手术失败了的女性，那么我就对她们进行了访谈。写了论文。写了论文之后，会发觉说原来这些做整形手术失败的女性她遭遇到的问题主要还是医疗行业的。就是全球女性主义都意识到做美容整形对女性的迁害是因为单一的美貌标准。可是除了美貌标准这种文化压迫以外，其实医疗里面，中国在这样急速发展的时候，这些人做整形手术，就是在一个房间或者美容院里面做，它没有手术所需要的基本的急救条件，所以很容易出问题。而那些医生其实都不是医生，ta 们很多原来只是美容师，不是有职业资格更有手术能力的医生，那么这就是我采访到的这些手术失败它之所以失败的比例这么高，是因为我们整个的医疗行业、医疗行业的管理的问题。我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后，我就跟我们的学生一起研讨。我让我们学生去看到问题，ta 们就会去做活动。例如说我讲完之后，马上就有学生觉得说要去拍一些小视频，也有一个学生写出了一个短剧来演出。后来我们觉得影响力还不够，于是就有人提议我们要做一个快闪，那个快闪我们也约了记者来，记者也给了我们很多意见。于是我们就有二十多个同学，拉了横幅，就在广州的地铁站，就去到一个地铁站，就在这种巨幅的美容广告下面，我们就是对它进行一些行为动作表示对它进行指责。那因为这是一个像是舞蹈一样的活动，所以记者

也很愿意来报道这样的活动。这样就是学生基于我的研究，有了想法，然后记者来采访 ta 们的时候 ta 们也能够论述得很好。例如 ta 们会说我们这个社会不要去谴责那些做美容整形手术的人，因为 ta 们其实也是这个文化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去反思这个文化。我们也应该去更多地引起人们对医疗管理、医疗安全的注意。于是记者也很高兴我们的学生能够把这些问题引入到这么深入的思考，当时的新媒体也发展得很快，所以主流媒体大幅地报道之后，这些学生回去之后转载在新媒体上继续讨论，其实它就变成是一个媒体教育、公众教育，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美容整形的问题。

另外的一个方法，先有社会活动，基于社会活动，我们再来做行动研究或者是相关的研究。这个方面举一个例子，我们从 2002 年就开始演出阴道独白，后来陆陆续续地我们都关注阴道独白。到 2013 年时，我们就觉得是阴道独白到中国的十周年，于是呢我们就想着要重新排演。于是首先是由我们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排演了一个叫做《将阴道独白到底》，它是基于采访中国的女性的故事，用中国人觉得更合适的方式来排演出来的戏剧。同时其实全国不同的妇女组织他们也排演自己的戏剧。我们排演之后还有个事情想做呢就是想把这些戏剧送回到那些社区，就是我们曾经到那些社区排演过的，农村妇女、受家暴的妇女、受性侵的妇女。我们想把这个戏剧送回到她们那里演出。那因为这个戏剧谈到性、阴道、身体，有一定的冲击力，回到那个社区演出时也有很大的碰撞。于是我就去观察这样一个过程。我也写了伊娃·恩斯勒的阴道独白如何在中国重新排演，人们如何借助这样一个平台把妇女、LGBT 群体、残障群体、受家暴的人群又通过演这个戏又联合起来。同时呢又让不同的社群的声音通过这个戏表达出来，让 ta 们的经验被看见。还有就是我们怎样把一部戏从舞台搬到社区通过这种比较灵活的形式来和社区互动。那么这样的经验跟伊娃·恩斯勒在全球所办的一个用《阴道独白》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方法很不一样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中国经验我们觉得需要把它写出来。所以就这这样我也写过两篇论文去研究我们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总结起来，我们主要就是有这样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先有研究，再有社会活动；另一个是先有社会活动，随后有相关的研究跟上。这是我们结合两者的做法。

问：在从事女权主义的研究和社会活动后，您的个人生活和思想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答：我个人生活来说，我开始和不同的社群有不同的交流。我个人思想的变化很多，例如把一些平权思想真真正正回到我的生活中来，因为我们不断地去反思权力关系，那么回到我们的生活，就像老师跟学生，我们家里面家长和孩子，以及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去到社群跟草根组织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我想都去不断地去反思自己，一个是更多地去分享知识，更多地去互动交流，更多地去了解别人的想法、别人的需求，而不是自以为是。这方面对我的思想来说是很大的变化。另一方面是自觉地跟主流的想法拉开距离。我们的社会如果你跟主流走得很近，我们想要的独立思考，我们想要的弱势群体、少数群体的发展，可能你没有办法坚守你的立场。所以呢就自觉地跟主流拉开距离，并且主流由此而得的相关利益你也跟它拉开距离。这样得话，更多的时间是和社群，是和草根组织的人呆在一起。这样的过程中其实我也欣喜地发现其实 ta 们很有能量，ta 们也许没有很多的知识理论，但是 ta 们在现实的生活中 ta 们是很有智慧的，同时也是很坚韧，ta 们去追求自己的权益，我也是从 ta 们那里吸取了很多营养。

问：能不能谈谈您对大陆女权主义发展的分析和评价呢？以及您对未来有什么展望？

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相信别的学者也能谈的很好。我自己的一个简单的分析我觉得在 95 世妇会前后，那一代的女权主义者，ta 们通过理论的进来，把西方的理论引介进来，并且踏踏实实地做中国的理论研究，并且也是通过 95 世妇会的契机把中国的妇女研究、社会运动跟全球联系起来，我觉得所谓第一代的，就是 80 年之后开始做妇女研究的这些学者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但是我也感觉到 ta 们想要做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想要把女权主义的理论、观念变成一个中国普遍接纳的观念，甚至形成一种文化。这样的努力还没有那么达到 ta 们想要的。也就是说女权主义理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陌生的，还是被抗拒的。在学术也基本上很难打动那些掌握学术资源的男性，或是那些很有影响力的学科。就是这样的广度也没有达到。

那么后来当 2010 年之后，更多的年轻的女性加入到运动里面来之后，其实年轻的女性她们的所长未必是像前辈那样的是理论和研究，但是她们很关切我们这个社会现实，并且她们能够利用新媒体、利用传播。所以她们反倒是在我刚刚说的这些理论如何影响到更多人，

如何更多人以此作为自己生活的准则，一些基本的观念，一些有共识的观念，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加入之后对这方面的推动是比较大的。

对未来的展望，我自己认为可能又要回过头来慢慢做研究，通过研究、通过政策倡导来去推动。因为我们现在的媒体并没有那么自由，我们原来由年轻人推动给的生龙活虎的媒体教育、公众教育、性别意识觉醒，现在已经暂告一段落。暂告一段落怎么办呢？我觉得还是回到学术研究，这是可能的一个通道。

问：国际女权主义对你个人有什么影响？

答：我觉得我个人跟国际女权主义的关联不是很密切。当然了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它是国际女权主义在中国的一个影响，我也受这个影响。另一个我比较具体的参与就是2015年我去纽约参加了联合国妇地会[NS1][MOU2][MOU3]（妇女地位大会），那一年会议的主题时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我也去听了很多会，开了眼界。同时我们自己也组织了一个论坛，去告诉其他国家的妇女我们在中国反家暴的进程是怎么样的，立法进程时怎么样的，以及整个中国妇女的地位取到了怎样的发展。那一次的论坛得到了很热烈的回应，所以我们也觉得在全球和其他妇女的交谈中我们自己既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且同时我们在参加其他论坛时也看到其他国家的妇女她们的活动其实是非常有创意、非常活跃的。她们的妇女组织比我们更活跃，所以也吸取了很多新的方法。

同时呢国际女权主义如果说 ta 有形成一些了重要的文献，例如说反对针对一切妇女的歧视等等的这些文献，也是我自己进行研究和倡导的重要文书。例如说2015年我就跟其他专家一起出了一本书，叫《中国妇女发展二十年》。这本书我写了一个很长的导论，在导论里我细致地梳理了在联合国的文书里跟妇女、儿童、老年人、流动人口有关的文书，总之我都梳理了。并且是用这样的一个联合国的指标、策略、视野来对照中国的政策，看看中国的政策是不是足够友好，是不是有前瞻性，目标是不是合乎真正推动妇女发展的。可以说虽然我们在组织形式上没有经常参加国际女权主义，但是从理念上我们还是很紧密地关联的。

问：您与国内其他妇女组织如何协同组织活动？

答：国内妇女组织有两类，一类是全国的妇女组织。我们的关系是松散的，如果有什么主题就一起联合。例如我是全国反家暴网络一个成员，于是反家暴网络有什么活动、调研、会议，我就响应，在本地搞活动。同时我也是一些全国妇女组织的成员，例如 2008-2010 年时我是全国妇女社会性别学科发展网络的理事，当时 ta 们选了我做理事，那我就参与其中去进行师资培养、政策倡导。同时在 2014-2016 年我也是另外一个网络，叫 GAD 网络，这是一个中国妇女组织联盟，我也是 ta 们的小组负责人这个小组在那些年的目标也同样是师资培养、政策倡导、关注社会新闻事件然后组织全国妇女组织来倡导。同时我们那一届出了我前面提到的那本书，《中国妇女发展二十年》，我们用这样一本书的形式来纪念世妇会在中国二十年，反思这二十年来妇女政策的发展。这个全国的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松散的关联。

我们跟广州的妇女组织，我们所在的这些关联就会比较密切。有一类也是只要有活动我们就一起办，例如说同城、同性恋亲友会、残培基金会、女友组，这些就是 LGBT 的、残障人士的社群，那我们就一起举办活动。此外我们跟新媒体女性网络，就是她们后来成立叫思瑾文化研究中心关联就非常密切，基本上我们所有的活动都一起办。例如说我们办过两次就是业余艺术家但是关注女性议题的艺术展，我们一起办过日军侵害女性的图片展，我们还一起去关注那些新闻事件，因为她们是媒体，善于追踪媒体实践，把 ta 变成媒体行动，我们善于把这些鲜活的知识引入到我们的课堂，或者是我们通过戏剧的形式来继续去表现它引起人们的关注等等。所以我们跟新媒体女性网络这样机构的关系是总是在一起，并在在组织活动时完全不计较谁做得更多，谁做得更少。也已经很形成一种习惯，就是谁在哪方面更专长，那就彼此合力来做。所以我们也试过当社会有性侵，侵害中小学生的事情发生后，我们也去妇联希望妇联和我们一起来倡导政策，然后妇联也跟我们一起去教育局倡导说要把性别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大纲等等这样很具体的事件。每次做样的事情时我们都把这个事情要在媒体告诉媒体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倡导，我们也实时写出调研和文书进行倡导。所以现在回忆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协作，也是我们体会到机构与机构间一起来工作的那种有效率有效果的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模式。

问：成为一名女权工作者你有哪些收获、失去、困难、不足呢？原因又是什么？

答：收获最大的丰富了我自己的生命，我因为认识不同的人，因为真正深入地去了解 ta 们的生命、需求、困境，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拓展了我自己，同时在工作过程中认识不同的社群，尤其是那些活动家，那些为了推动社群发展去努力的人，ta 们的努力本身就很精彩。这样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是非常符合我的生命需求的。我原来就是想做这样事情，我像我跟我的当时很多朋友感觉到可以视为人生理想，可以努力一直投入的工作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有非常多的困难，早期主要困难当然是资金不足，后来等到我们找到了工作方法之后其实资金也不是主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做出来的事情有影响，那么我们要募集资金也容易了很多。所以后来的困难变成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很可能因为一些外部的原因而停止了。我们好不容易探索出来一些工作的模式，我们也跟社群熟悉起来了，但是可能就又不能继续做了。

例如说 2013 年我们排演了《阴道独白》。当时在校园演出时很多很多人感兴趣，可以说每场 300 人来看。根据当时的需求来说，就说明我们排演了一个很能引起人思考的戏剧。那很多的高校都向我们发出邀请，希望我们去他们那里演出。但是也许是我们的动员能力太强，就是每一场有几百人来看，最后我们在大陆的高校就不能再演了。当然我们也还做了一些努力，我们紧接着第二年的春天我们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演出，虽然我们是普通话演出，但是也在当地引起学者们、对女权感兴趣的、对戏剧感兴趣的、热烈的回应。我们这个演出也就到此为止了，后来就没有办法继续演出。对于我们投入非常大精力来采写剧本、排演的年轻人来说应该说也是一个挫败，因为 ta 们投入那么多心血做的事情当然希望有更多的演出的机会。

另外的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在课堂里面已经发展出一些讲性别议题好的方法，我们请社会组织的人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跟学生讲课，ta 们通常都很能激发我们的学生去组织小组，真真正正地做调研，服务社会，同时 ta 们有可能培养出很有领导能力的学生。所以这些年轻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寻找到一种通过学习，然后去到社区，成为 ta 们的领导，去寻求新的倡导的方式。就是正在这样运作非常好的时候，那么 2016 年我们也不能这样上

课了，不仅不能这样上课，就连这个性别公选课也停了。所以这算是一种更大的困难。就是我们探索出来的模式最终只能整理成好像学术研究一样的，而不能继续去完善，继续去因应一些问题继续探索下去。

不足的话，每一次活动我们都感觉到有不足，对我自己来讲，比较难的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全职的教师，我也还要兼顾家庭，所以我的时间精力总是不足的。所以每次活动都觉得很仓促。我们也意识到要培养更多年轻人，但其实能投入的精力也是不够的。

问：您曾经负责过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和广州海珠区的山泉剧社，请问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答：最大的感受是管理一个社会组织有很大的难度。原来我们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是基于学校的，所以没有什么机构管理的工作，参与论坛的老师、学生，用活动来组织就行，比较简单。但那时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学生，研究生两年就毕业了，本科生也是一二年级开始了解我们，然后三四年级要参与一些活动才有点经验，ta们又毕业了。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培养学生，不断地去把我们这样的工作模式希望能够复制下去。所以当时的感受是谁能够留下来继续做就好了，但是也不可能。后来直到我们2014年排演完《阴道独白》之后，这些演出戏剧的年轻人、年轻学生，确实非常认同这种通过戏剧进行性别教育的工作方法，所以她们成立了山泉剧社，这样的话她们就终于留下来了。她们没有去找别的工作，她们知道她们的性别理论的学习已经很扎实了，怎样去做社群活动也有很多经验了，结果她们就在过程中就发挥很大的力量，例如说把这个戏剧的方式 - 要用应用剧场、互动剧场，用很多灵活的方式去到社区活动。

但是这里面又有新的问题，就是山泉剧社是在民政局下面注册的机构，所以你要管理到这些人员的工资、社保、交税，被各种检查。就这个行政的工作是非常的复杂。这个也超出我的把控。所以要让一个妇女组织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体制下去生存，其实ta又面临新的问题，那就是你需要专人去管理。而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利用业余的时间能够管理得好。

问：您对未来有哪些计划和展望呢？

答：首先，应该说我对未来没有太多的计划。就像刚才说的，山泉剧社因为我们所办的一些活动在民政局的管理之下被认为这个工作有点敏感，所以山泉剧社已经被要求停止活动了。那我们在校园里面的课程也取消了。所以我原来的工作模式，我前面所谈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方法现在基本上都停止了。那我还可以做的就是有时候根据 ta 们的需求做一些性别方面的培训。通过这种方式还让人群们在一起并且还有一些学习。所以对于未来，如果是还可以怎么做的话，在可见的未来两三年，我想我们可以做的还是只是学术研究。那么目前学术研究还是可以开展，我觉得学术研究也是一个方法让我们重新再去更好地了解我们社会的性别的问题。有了研究以后，当这个社会认为可以进行倡导了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再寻找机会。

问：您对组织的未来有哪些计划？

答：现在的组织除了被关停了就是关停。没有被关停的 ta 们的活动也是很受限制。学校里面的很多妇女组织，中山大学的两个妇女组织也是被注销了。那么很多其他学校如果 ta 没有被注销，ta 也会受到更严格的要求。所以组织化方面，我觉得不应该是现在的计划。现在应该是一个打破组织化，重新像游击队一样的，或者是个人努力，从不同的角度松散地去做一些活动。或者是说让原来很直接的倡导、很直接的呼吁变成间接的，或者是说把年轻人的培养，把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成长，甚至锻炼身体的，这样的事情打好基础。因为我们处于一个暂停的阶段。有一个好的身体，过好生活，把家庭什么的之前耽误的事情也做好，然后再静待时机。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这段时间暂停的活动，原来很投入的一些妇女的活动家，其实她们也遭受到很多的挫败感，有很多的创伤，我认为是需要一些时间大家去直面这些问题，去修复这种创伤。我自己也有跟朋友去办写作营，这时可能是静下心来去写作、去反思，先进行个人的表达，也是一个修复的过程，同时也让社群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联合。我们现在的工作方式不可能像以前，就是社会有问题我们就商量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而是我们更多地是返身回到自身，在自我的成长方面，以及社群的连接方面，做一些新的建设的工作。
